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

1644—1945年的中国

Law, Resources and Time-space Constructing

China in 1644-1945

第五卷 经济开发

张世明◎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

1644—1945年的中国

Law, Resources and Time-space Constructing

China in 1644-1945

第五卷 经济开发

张世明◎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 1644—1945 年的中国 (一至五卷) / 张世明
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218-07721-5

I. 法… II. 张… III. 中国历史—研究—1644~1945
IV. ①K249.207②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2738 号

FALÜ ZIYUAN YU SHIKONG JIANGOU: 1644—1945 NIAN DE ZHONGGUO
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 1644—1945 年的中国
张世明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曾 莹

责任编辑: 卢家明 柏 峰 林 冕 张贤明 陈其伟
特约编辑: 喻春兰
装帧设计: 新角度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恒美印务 (广州) 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18-07721-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19 字 数: 3050 千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39.00 元 (全五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9667808

目 录

第一章 “西部”空间意象的形成	001
第一节 “西部”空间观念与行政区划的建构谱系	001
第二节 近代“西部”空间境像的变化	029
第二章 经济重心的转移与经济空间的扩展：近代中国的西部 开发与民族国家的形成	056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的转移与经济空间的扩展	056
第二节 东西钩：民国时期工业内迁的变局	079
一、“东盛西衰说”	083
二、“民族复兴基地说”	084
第三节 近代西部开发与民族国家建设论衡	111
一、走入近代的历程：中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难局	111
二、近代西部开发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区域类型学 分析	147
第三章 时空之旅：中国西部开发与现代化	238
第一节 时空问题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理论的关键	238

第二节	中国西部近代农业开发	280
第三节	农田水利事业的新气象	291
第四节	林业的开发成就	304
第五节	稚弱的工业开发蹒跚迈步	316
第六节	交通体系的更化	327
第七节	教育科技事业的发展	360
第八节	中国西部开发在西力作用下的空间互动影响	398
第九节	从时空角度解读中国西部地区现代化	429
	一、城市空间的膨胀与压缩	478
	二、城市公共空间的重建	486
	三、城市空间控制技术的改进	493
第四章	经济空间拓展的核心机制：企业法律形态	507
第一节	旅蒙商的股份制	508
第二节	自贡井盐股份制	542
第三节	公司与现代国家的同构性	582
第五章	一种另类社会空间：中国西部开发中的移民社会	614
第一节	中国近代人口压力与人口迁移	614
第二节	法社会学视野中移民社会的特殊性	626
	一、移民社会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629
	二、移民社会无序动荡性	639
	三、移民社会组织形态变异性	652
	四、移民社会土客矛盾凸现	659
	五、移民社会文教落后	675

第六章 生存空间：近代西部开发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及

教训	680
第一节 天殇：在经济开发中滥觞的生态环境思想	680
第二节 多变量思维取向：农业经济开发、生态环境变迁与 现代化	700
第三节 从游牧社会内部发现历史：对现代游牧社会农业化 现象的反思	730
第四节 水主沉浮：清代黑河水案	755
一、清代高台作为边疆社会的空间特性	755
二、资源状况	763
三、高台县水案的文献疏证与辨伪	775
四、规则的演变	801
五、结语	820
后记	822
原典与原点	824
理解与移情	839
鸣谢与说明	849

第一章 “西部”空间意象的形成

第一节 “西部”空间观念与行政区划的建构谱系

在过去一个世纪里，社会科学的空间范围得到空前扩展。1923年，有“观念史研究之父”之称的美国学者罗孚若（Arthur O. Lovejoy, 1873—1962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创立“观念史研究俱乐部”。1940年，罗孚若及其同道又创办迄今颇具影响的“观念史研究学报”（*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罗氏的代表作为《存在的大链锁：观念史研究》（*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罗氏之所以采用“观念史”而不采用“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一词，和余英时研究清代思想史时注重思想史发展上“内在的理路”（inner logic）的路径取向颇为相似，采取殆近于分析化学对化学元素的分析处理方式分析复杂而异质的观念集聚体中的“单位观念”（unit idea）或“观念丛”（ideas-complex）的演变，有意无意之中以观念演化本身具有自主性为预设前提，偏重于思想史演变的内在逻辑，以此与采取“外在研究法”偏重于观念或思想与人类行为关系的探讨的“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相疏离。罗氏的上述研

究方法具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即对思想史上观念的相承面特予注意而于其创发面不免相对忽略。^① 在 20 世纪早期，重视思想与环境两者间交互关系的思想史外在研究取向的学者即对罗氏的立场不以为然。佩里·米勒（Perry Gilbert Miller, 1905—1963 年）曾云：“思想是时间与空间的产物……它们产生于权力关系之中……”^②

降及 20 世纪下半叶，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年）在其《知识考古学》对那些被称为观念史（l'histoire des idées）、思想史的学科提出了猛烈的抨击，认为思想史（观念史）总是要在零乱之间找寻连续性和总体性，因此主张以考古学取而代之，指出：“考古学的描述恰好是对观念史的摒弃，对其假设和程序的系统性拒绝，它试图实践一种与人们所言的截然不同的历史。”^③ 福柯所谓的考古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古代文明发掘与研究，而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按照福柯的阐释，考古学与观念史有以下四个重大区别：（1）考古学所要确定的不是思想、描述、形象和主题等明露暗藏在话语中的东西，而是话语本身。观念史则将话语作为隐藏了主题和秘密的资料和符号，它要破译这种不透明的符号而抵达话语背后的本质深度。换言之，考古学不是一门阐述性学科，因为它不寻找隐藏得更巧妙的“另一种话语”，它拒不承认自己是“寓意的”。（2）与观念史寻求过渡性和连续性不同，考古学致力于话语的特殊性和差异性。（3）观念史将作品的理由与一致性原则归之

① 杜维运、黄俊杰编：《史学方法论文选集》，台湾华世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81 页。

② Perry Miller, Jonathan Edwards to Emerson, *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XIII: 4 (Dec., 1940), p. 592.

③ Michel Foucault, *L'archéologie du savoir*, Paris: Gallimard, 1969, p. 181.

于作者个人，而考古学则断然拒斥了这一点，它反对将作品作为分割话语的单元，亦明确抛弃了创作主体决定论，考古学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和规则，话语实践是自主性的，创作主体这一层次对考古学而言并不相干。(4) 观念史信奉还原性原则，试图寻求话语的起源，重建人们在说出话语瞬间的心理情境，而考古学明确反对这一点。它“不是向起源的秘密深处的回归”，而是对特定的话语——对象作系统描述。从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中，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应该在探求历史规律的旗帜下冠冕堂皇地放弃逼视历史丰富性的责任，因疏简而牺牲驳杂，因抽象而牺牲具体。可以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对于我们分析关于“中国西部”的话语知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就本质而言，我们目前进行的中国近代西部开发史研究属于区域史研究的范畴。什么是区域史研究？区域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国内外学术界似乎均缺乏可资参考的著作和论文，基本上处于一种日用而不知的经验形态。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指出：“在 19 世纪后期，构成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有三条明确的分界线：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再次，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这些分界线中的每一条在 1945 年以后都开始面临挑战。或许，1945 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创新便是出现了一个称为地区研究的领域，它是一个新的制度性范畴，用于把多方面的学术工作集合在一起。这个概念首先出现在二战期间的美国，在战后的十年里，它在美国被广泛地实施，随后又传布到世界其他地

区的大学。”^① 我们从区域研究的缘起可以明显看到福柯所揭露的知识背后的权力运作的隐约身影。因为，美国等在全球范围内享有广泛海外利益的国家出于称霸世界、主宰世界的政治诉求，亟须了解不同地区的情报资料，所以所谓“中国通”、中亚专家、中东问题权威等分区域的专门人才大量应运而生，从而使区域研究渐呈兴隆之势。从根本上说，区域是根据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对连续的地表空间划分的结果，是一种主客观作用的结合。区域科学的创始人艾萨德（Walter Isard）即云：“一个有意义的区域概念，取决于我们要研究的社会问题，而这一问题，又取决于我们认为重要的社会 and 个人的面貌特征。”^②

学术界对区域研究的方法在国外起初均以行政区这种政治权力的建构物为确定区域单位的依据和准绳。后来，人们认识到空间绝不是一种一无所有的“空无”，它的内部具有互相联系的网络神经彼此勾连而成为具有统一性和灵性的生命有机体，这种网络神经不仅包括河流水系等自然网络，也包括施坚雅所谓的小农经济的市场网络等人为现象，所以，在区域研究方法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中，“景观研究”成为核心术语和划分区域单位的依据和准绳。在区域研究方法发展的第三阶段，景象（*imagination*）或意象这一更富有主观色彩的词汇成为研究的核心目标，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对社会空间和区域的空间感觉、区域意识的阐幽发微。例如，目前，在现象学、心理学的激荡冲击下，法国表象史（*l'histoire des représentations*）在史学界大行其道，强调对人们对现实社会空间感知的历史研究。这种学术方法的嬗变昭示我们：区域单位绝不是单纯的客观自在之物，而是一个知识的概念。对

①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39—40 页。

② 艾萨德：《区域科学导论》，陈宗兴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6 页。

“中国西部”这一概念，如果仅从政策注解角度出发，我们只需以依据中央关于西部开发的决议文件搬字过纸地照单誉录为已足，但如果从纯粹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我们就应该镜鉴比照美国地理政治学家琼斯（Stephen Barr Jones）“统一场域理论”（unified field theory）中所揭示的“政治观念（political idea）—决策（decision）—运动（movement）—场域（field）—政治区（political area）”这一思想—区域链（the idea-area chain）的分析框架，对区域与思想观念乃至区域政治制度的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①

正如近代以来西方人以东亚的中国和日本等为远东，而中国以欧洲为泰西相对称一样，任何空间方位所指都是具有话语主体的本位立场预设的。正如“西方中心观”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受殖民霸权势力的影响仿佛幽灵般四处游荡，其实中国人长期以来受“正统观”的影响也存在着难以祛除的“中原中心观”的心理阴影。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对其自身内部以某一地区为核心再向东、南、西、北四周进行辐射式划分和描述，乃是一个自古以来从未间断的现象。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自然地理著作《山海经》便呈现出“一点四方”的文化空间结构的意识萌芽。早期“一点四方”结构的中心之点定位在黄河流域的中部地带，即今陕西、山西、河南之间。这种“一点四方”结构以中原汉文化为本位，把周围四方称为蛮夷，中原是主，是文明的典范，边疆地区是从，是仰承绥抚的边陲。例如，“西南”一词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都已隐含了一

① Stephen B. Jones, A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Political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ume 44, Issue 2, June, 1954, pp. 111—123. 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柏格森（Henri-Louis Bergson, 1859—1941年）的哲学。柏氏即将以时间形式的意识流视为创造的泉源，创造出来的成果僵化成制度才是流于“空间化”。

个视角前提，即以中原汉文化为中心，是中原汉文化的西南（西南方、西南部），因此，相对来说，“西南”是一种他称。事实上，“西南与中原的关系，从公正的立场上看，应当是一种双向导通的活动，即中原施加其影响于西南，同时西南也施加其影响于中原，双方的作用就全局而言应该对等”^①。随着中国边疆史研究的深入，学术界越来越认识到过去动辄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是存在极大片面性的。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西北和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所占地域将近三分之二，在这广袤的地区，新疆和宁夏等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化和蒙藏等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是不容置之度外的，中国传统文化决非铁板一块。^② 基于此，我们不能一如其旧地囿于从中原看边疆的视野框架，更应该致力于设身处地的中原与边疆地区的互视。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提出的“清朝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论断，包含着丰富理蕴。清朝是由满族统治者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清代历史具有鲜明的“满族性”，满族统治者的疆域观无疑具有与汉人不同的内涵。譬如，一般学者往往受汉文史料的影响颇为关注康熙帝、乾隆帝的“南巡”，有关“南巡”的论著和文章为数不菲，当然清史学家在论述清代边疆民族政策时亦会提及“北徯”，以此作为阐述清朝统治者笼络和团结北方少数民族的证据，但是，学者们没有看到“南巡”与“北徯”之间的关系，“南巡”可以说是与“北徯”相对而称，这反映了满族最高统治者的疆域观和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即：满族最高统治者以广大的汉族地区（主要指清代的内地行省地区）和蒙藏等辽

① 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9 页。

② 张世明：《中国经济法历史渊源原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27 页。

阔的少数民族地区为天平两端的肩荷者自居。正是这样，何伟亚的《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 1793 年马嘎尔尼使团》（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认为清朝对其帝国的想象（imagining of empire）是一种“以清朝皇帝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multitude of lords）；而我国学者汪晖也分析了在清代政治话语中庄存与、刘逢禄等汉族知识分子今文经学中“大一统”观以承认清王朝合法性为前提，既对满汉不平等、世卿擅权等现象深怀不满，又力求为建立容纳文化和制度的多元性的礼仪中国的理论微言大义之所在。^①

中国古代交通的落后造成空间距离相对而言比现在的心理距离遥远，“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和“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的警告，使中国人长期以来的结队旅行多系在名山胜境的流连，即顾颉刚所谓的“清游”，进行长途搜奇探险的考察“壮游”则难得一见。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将徐霞客、梁质人、陈伦炯三人誉为“探险的实测的地理学者”，其中陈伦炯著有《海国闻见录》，系航海探险家；徐霞客以《徐霞客游记》饮誉中外，主要是对中国西南地区进行探险；梁质人的《秦边纪略》多不为人所知晓，但他实属清初中国西北地区行游考察的重要人物。潘耒在《徐霞客游记》序中云：“余求得此书，知出玉门关，上昆仑、穷星宿海诸事皆无之，足迹至鸡足山而止。其出入粤西、贵筑、滇南诸土司蛮部间，沿溯澜沧、金沙，穷南、北盘江之源，实中土人创辟之事。读其《记》而后

① 汪晖：《礼仪中国的观念与帝国的合法性问题——今文经学的“内外”观与清朝的帝国视野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 年第 1 卷第 1 期。

知西南区域之广，山川多奇，远过中夏也。”^①对西北地区的考察，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自然功不可没。全祖望所撰《顾亭林神道表》记其事云：顾氏“遍游边塞之区，游历所至，二马二骡，载书自随，遇边塞亭障，必呼老兵退卒，问其曲折，与平日所闻不合，即于坊肆中，发书对勘。故于山川险要，皆经目击，因能言之了了，如指诸掌”^②。不过，顾炎武在西北游历的范围和成果毕竟难与梁份相媲美。我们可以从《秦边纪略》看到这样的文字：“今之疆域率由明旧，可考而知也，其地南始于阶州而河州而西宁，折而北而庄浪，又西而凉州、甘州、肃州，东而靖虏、宁夏，极于榆林，皆边卫也。其塞则或山或河或长埴，其缘沿道里则六千九百里有奇。”^③梁份的这段文字反映了当时清朝初年的疆域实际上仍保持着明朝统治势力的范围旧貌。这一点，在年羹尧的奏折中也言之甚明，其文为：“我朝边界，大抵皆从明旧，未有议及于此者，附近内地虽有边墙，蜿蜒（蜒）而抵甘州，但沿边隘口不可胜计。……且甘、凉之间，有曰黄城儿者，两山如阙，原为天设之险，乃舍此而不守，而守内地，则边

① 潘耒：《遂初堂集》卷七，“徐霞客游记序”，《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1417，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7页。亦可参见徐弘祖：《徐霞客游记》，卫建强等校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4页。

② 转引自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页。类似记述亦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八，钟哲整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页。

③ 梁份：《秦边纪略》卷一，同治壬申年安徽藩署敬义斋刻本，页一。或可参见梁份：《秦边纪略》卷一，王德毅等编：《丛书集成续编》244，史地类：防务、西域地理、世界地理、亚洲地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92页。

地所有险隘，蒙古与我共之。”^① 在清朝初年，皑皑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许多地区均为游牧民族跃马扬鞭而被鞠为茂草的活动空间，与后来农耕社会的景观大相径庭。唐人韦应物有诗曰：“胡马，胡马，远放焉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② 这种纵情驰骋与迷茫凄凉的交织意境恰是清初活动于此的牧人们内心情愫的写照。

是时，清人对新疆、西藏的地理认识十分匮乏。提督殷化行在《西征纪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清廷调集诸路大军征讨噶尔丹，陕甘方面清军将领“初在庄浪时，诸公议从崑都伦进兵，本出上指，然其路在荒外，鲜有知者。余揣噶尔丹所居宜在京师西北、山西之直北而宁夏之东北也，若从崑都伦则偏于西，恐不得遇寇。众莫敢决。及还镇，闻有副都统阿南达者，适奉使祝，囊在宁夏边外，余知其习荒外情事，使人候之，质以遇见，阿公曰：是几大误。至是奉上谕改从宁夏，盖其还奏所定也”^③。终康熙一朝，在绘制《皇舆全览图》的过程中，尽管清王朝多方努力，但由于新疆当时尚未被纳入统治管辖范围之内，虽然康熙《皇舆全览图》上西北地区绘制到西经 40°左右的伊犁河附近，但事实上从西经 26°至西经 40°之间多为空白，所标示地名寥寥无几，表明康熙朝清廷对天山南北地区的地理认知尚属浮皮潦草。另外，众所周知，“西藏”一词最早见于康熙二年（1663 年）的《平定西藏碑》和果亲王的《西藏记》，通行于乾隆时，

① 《雍正二年（1724 年）五月十一日年羹尧奏陈平定罗卜藏丹津善后事宜十三条折》，《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53 页。

② 韦应物：《韦苏州集》卷十，胡风丹辑：《唐四家诗集》第 2 集，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18 页。

③ 殷化行：《西征纪略》，王德毅等编：《丛书集成续编》280，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 年版，第 830 页。

所指为康、卫、藏、阿里四部。清初崇德、顺治两朝并未称卫藏地方为西藏，而称之为图白特（土伯特）、唐古忒，有时称之为“国”，有时称之为“部落”。顺治九年（1652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厄鲁特部落顾实汗表贡方物，兼请达赖喇嘛还国”^①。尽管清初满文中“国”和“部落”使用混乱、界限模糊，但清王朝当时并未将西藏纳入直接管辖的事实乃彰彰甚明。康熙年间绘制《皇舆全览图》时，清政府曾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等人“奉命西行，用绳丈路，仪器测量，沿河绕行，遍历河源并金沙江、雅芦江、浪沧江、怒江等源，直过西藏三千里抵恒河而回，皆亲临目睹”^②。在此次测量中首次发现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ri bo jo mo glang ma），并第一次在地图上标示出来，比印度测量局的英国测量员乔治·埃佛勒斯（George Everest，1790—1866 年）于 1852 年测量此峰并定名埃佛勒斯峰早 135 年。然而，这次测量由于策妄阿拉布坦扰藏而仓促结束返回，因此翁文灏颇为中肯地指出：“康熙时代西藏地图，殊不及内地及满蒙之详密，而于藏地西部，尤未详勘，故多错误。”^③

从 17 世纪以来，准噶尔崛起西北，割据称雄，对于清政府长期抗命、对峙，并且屡次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西藏，干戈扰攘数十年，成为国家实现统一、安定的主要障碍。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具有雄才大略，在清初八十余年时间里与准噶尔割据势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正如魏源在论述清朝

①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台湾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60—1970 年版，第 833 页。

② 通智：《河源记》，转引自王树人：《清代记述河源的一篇重要文献——通智的〈河源记〉》，《西北史地》1989 年第 1 期。

③ 《地学杂志》第 19 卷第 3 期，转引自王庸：《中国地理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第 119—120 页。

经营西北、西藏问题时所言：“圣祖垦之，世宗耨之，高宗获之。”^① 由于康、雍、乾三朝赓续相继的努力，清朝版图空前扩大。所以，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乾隆帝专门颁布了一道颇有意思的谕旨，曰：“今准噶尔、回子诸地均已平定，巴里坤以西皆属内地，不可仍以凉州、庄浪为边徼。”^② 这与当年梁份《秦边纪略》的疆域空间图景适成对照。林则徐在《荷戈纪程》中描述其途经河西走廊的情形时说：“连日所过大路之旁多依山为墙，闻系明代所筑边墙，与蒙古划界，墙以外六十里仍为汉民游牧之所，六十里外乃蒙古牧地，今犹循此制，土人以为即万里长城，非也。”^③ 事实上，清初仍在甘肃、青海等地为防止准噶尔势力侵扰尚有修筑边障之事，然而到道光年间，甘肃一带土著居民竟已将这里的边墙遗迹遗诸历史记忆的晦暝之处。正是这样，龚自珍以豪迈的情感和开阔的空间视野描述了清王朝“中外一家”的大一统气象，他说：“国朝边情边势，与前史异。拓地二万里，而不得以为凿空；台堡相望，而无九边之名。疆其土，子其民，以遂将千万年而无尺寸可议弃之地，所由中外一家，与前史迥异也。”^④

从语用学角度来看，清朝人在康、雍、乾时期有“旧疆”、

① 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8页。何秋涛《朔方备乘》也有类似表述。参见何秋涛：《朔方备乘》卷四，《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67页。

②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687-1。转引自吴元丰：《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清史研究》1994年第1期。可另参见吴元丰：《清代伊犁满营综述》，王鍾翰主编：《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③ 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室编：《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19页。

④ 龚自珍：《御试安边绥远疏》，《四部备要》，集部，《定盒全集》，《定盒文集补编》卷一，第130页。